

王军 著

上海沦陷时期

《万象》杂志研究

上海沦陷时期，广大的市民以及进步知识分子，在雅与俗、市民与文人、『鸳蝴』与海派、民族认同等问题上有着怎样的追求，本书以此期支撑时间最长、地位最显赫的文学期刊《万象》杂志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审美相结合的方法，参之以文献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基础上，为您一一呈现。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上海沦陷时期《万象》杂志研究



王军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沦陷时期《万象》杂志研究 / 王军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206-05538-6

I. 上… II. 王… III. 文学—期刊—研究—上海市—民国

IV. I209.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7113 号

上海沦陷时期《万象》杂志研究

著 者: 王 军

责任编辑: 吴兰萍

封面设计: 张 娜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长春市南关区太平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250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05538-6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目录

绪 论	001
-----------	-----

上篇：前期《万象》

第一章 “肃杀之气中独放灿烂之花”：

通俗小说的形态	023
一、社会小说：以通俗故事模式、市民视角叙述 沦陷生活	028
二、历史小说：“故事新编”的反讽宣泄与历史 小说的抗战主题	042
三、侦探小说：冷峻的讽刺与诡奇情节的结合	060

第二章 市民文学空间的现代性建构

一、以超越伦理道德的人性视野透视婚姻	081
二、“小儿女”恋爱故事的表现	095
三、扶持“小姐作家群”	102

第三章 前期《万象》散文杂文形态

一、散文：现实世相与现实心态的结合	124
-------------------------	-----



二、杂文:隐晦曲折与尖锐泼辣的结合	136
三、在融合“新旧”、吸收新文学方面的其他表现	141

下篇:后期《万象》

第一章 沦陷时期的“国民性”批判与建设	165
一、落笔于普通的生活张扬现代个体解放精神	165
二、国民人格的建设:平民的坚韧、“流贼”的忠诚 与知识者的自守	175
第二章 小说创作:开掘都市人性	184
一、文学观念上的建设:社会矛盾与人物“情欲” 透视的结合	185
二、表现都市小人物灵魂的呼号	190
三、表现都市中层人物的世情人性	208
四、《万象》上的“世故才女”张爱玲	223
第三章 散文的新生面	233
一、旧城记忆:风流、韵致、辉煌、美丽	233
二、日常生活视角中的平民疾苦	239
三、通讯特写:战争时期民生疾苦的记录	242
四、面向青年市民的海派娱乐文化	246
参考文献	254



绪 论

一、研究《万象》的意义

任何历史的记述，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记述者的虚构，要想认识已经消逝的历史，必须还原记述者的虚构视角，不被其记述内容所牵引，从而更为深入的认识历史，把握现实。期刊就是历史叙事的一种形式。期刊既是文学的载体、资料库，也以自身的想象，塑造新的文化品格。但我们往往关注期刊里的文学，忽略了其自身对文学的选择。在这一新的认知视角中，我们可经由期刊去探求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变迁的内在逻辑。上海作为中国一个迅速崛起的都市，是与这一历程紧密相连的，战争可以说是现代性一个极端的事件，在这一视野中沦陷上海的期刊就很有关注的必要。

上海“孤岛”后期、沦陷时期产生了一份最具影响的杂志《万象》。继顾冷观编辑的《小说月报》于1940年10月创刊之后，1941年7月《万象》创刊，打破上海文坛的沉寂，在出版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它吸收了期刊读者市场最大的份额，发行量在两三万册左右，远远超过当时普遍的四千册水平。由《万象》的畅销，带动了其后市民性杂志《大众》、



《紫罗兰》以及《春秋》的兴起。《万象》编辑上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24册（1941年7月第1年第1期—1943年6月第2年第12期），主要由陈蝶衣编辑^[1]，面向市民大众。后期19册（1943年7月第3年第1期—1945年6月第4年第7期）主要由新文学家柯灵接编^[2]，面向知识分子。1944年12月第4年第6期后，因柯灵被捕，《万象》脱期至这一年6月份，由万象月刊社编辑最后一期，至1945年6月停刊。

日伪统治下，一份依靠读者生存的刊物，是否丧失参与社会发展的勇气与胆识？从理论上讲，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有冲突也有一致，社会责任也可回报商业利益。在沦陷上海，二者是相反相成地统一起来。并且，商业性成为一种保护色，使《万象》巧妙迂回、充满活力地进行话语争锋，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危难时期的骨气与思想生命力。一种出版物的畅销，在于较之其他出版物，更能反映时代的脉搏，更具有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是时代的所有成员所具有的共同的被压抑了的情感体验所激发出来的一种力量。《万象》的畅销就在于它能有效地将沦陷上海的情感体验激发出来。从《万象》杂志可以透视出沦陷语境中的市民、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精神趋向和艺术表现。这必然涉及到雅与俗、“鸳蝴派”与海派、市民与文人、对五四文学传统的承传与变革等系列问题的话语谱系。

前期《万象》是当时市民文化的标本，它所营造的市民话语有什么样的特点？从篇目上直观地来看，刊物对科技非常重视。一是战争科技，如《轰炸机战士》、《窃听全球》、《超音波的效用》、《武器的伪装》、《未来飞机的设计》、《橡皮与战争》、《飞机轰炸与鱼雷攻击》，捕捉的都是前沿



信息，1942年7月和8月还分别刊登了《人与细菌之战》、《未来的原子战争》；二是生活科技，如《电眼》（笔者注：自动感应装置）、《干冰》、《植物的宝库》；三是医学科技，如《电医生》、《人的诞生》、《人造血》。在生活科技、医学科技的关注中，身体保健是一个重要角度。《万象》上有关身体保健的内容比较多，广告上除了家庭日用品、女性美容用品，再就是保健品了。因为讲究科技与身体保健，《万象》1942年7月登载的一篇名为《科学夫人》的小说，写了一位生活中处处讲究科学以至于难以正常生活下去的“科学夫人”，从中可见科技氛围的浓厚。另外，杂志的广告中，“爱”是普遍运用的营销概念。比如，一则美容用品的广告语是：这就是“爱的霜”，使她变得更美；美国出品的“ELGIN”手表广告语出以“爱而近”的谐音，商品以女性对爱的需要来激发购买的欲望。在一个“爱”被经济、名利等世俗利益解构的文化气氛中，“爱”还是一个针对女性的营销诉求。深入杂志的内容，进一步地、完整地来看，是怎样的情形呢？

如果说通俗文人以往创作的态度是消遣，消遣中有益于世，那么现在抗日的烽火，民族的危亡，一下子使通俗文人血脉贲张，充满了对现世人生的批判性。沦陷上海，投机囤积盛行，广大市民饱受动荡艰辛之苦，刊物的“最前端意识”就是汲取新文学的现实批判精神，共时性地表现民生疾苦。叙述风格上又与当时的新文学作品悲天悯人不同，具有市民生活风味，活泼亲切。社会小说的叙述主体，是和小说人物一样在生活里摸爬滚打，深受轧米、轧油之苦的普通市民，“原生态”地展现普通市民生存状况。在对现实的批



判中,“故事新编”和“侦探小说”充溢着戏谑性地宣泄、冷讽。这是基于一种统一价值体系崩溃的时代出现的“革新的破坏者”。小说抨击了所谓的社会清流、名流:身为主持教育的校长,对孤岛难民的孩子趁火打劫;本为清净之地的佛家沉浸酒色财气,并且还有阔太太供养;民不聊生中所谓的名人都是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者,坚守文化教育岗位的人则只能贫穷潦倒。现代作家中,从鲁迅到钱钟书,都习于反讽这一手法讽刺现实。《万象》还以言情或从历史中取材的隐蔽性、间接性特点,曲折含蓄也更为集中地表现打杀汉奸、反抗日伪统治等在沦陷时期非常尖锐的主题。文体上,以平襟亚为代表的《故事新编》,是市井风味的,文思绚烂、敏捷,气质上为传统“小说”味,但技法上,又是欧化的新文学的。以孙了红为代表的侦探小说,是通俗海派风格了,汲取了不少现代心理分析手法,表现人物。

于市民文学空间的现代性建构,也是《万象》的一个致力方向。研究者提到40年代的海派,一般指的是张爱玲、苏青以及予且的市民小说。从海派视野看去,《万象》前期,已融入了市民精神气质,在市民非常关注的婚姻、恋爱、女性等话题上,实现了通俗文人向现代市民的转变和更新。前期《万象》是40年代一道通俗海派小说的亮丽风景,在殖民文化专制空间中,刊物依托市民的精神需求,致力建设新文学发展中占边缘地位的市民文学,“安慰和鼓舞他们被日常忙迫的工作弄成了疲倦而枯燥的生活”^①,也是明智的选择。

都市的发展,女性相对增强的性受选择自由,使婚姻家庭的社会角色功能已然降低之后,婚姻自身的问题,显著地浮显出来。《万象》对婚姻的透视,视点就不在婚姻与社



会，而是转向婚姻自身。对夫妇之间的微妙心理，进行人性的解剖。对婚外恋情，不是简单的道德谴责立场，而是抱以宽容的心态，描写过渡时代男女就婚姻问题在社会道德与人性自我之间的矛盾与痛苦，展露婚姻的现代矛盾。关注夫妻感情，也汲取了现代心理分析理论，对家庭中一方出现的同性恋爱给以正视。在1941年8月号《万象》“新闻卡通”上登载了游泳名将杨秀琼被丈夫无故痛殴，以致皮破血流，提出控告伤害的新闻，旁附两幅杨秀琼与丈夫在香港拜堂结婚时的照片，以形成对照。杨秀琼是30年代的体育明星，蝉联全国的游泳冠军，有“美人鱼”之称，乃风行一时的上海名媛。对这一名人婚姻的关注方式上，不难看出《万象》对婚姻的态度：两情相悦止于婚姻的浪漫想象，经常被现实的残酷击碎，现实婚姻生活中没有自由恋爱时期憧憬的那么好，或因情欲，或因物质，或因情感需要调剂而出现种种问题。

恋爱小说中，主要是把恋爱作为本体，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表现其中的情感迷宫，呈现“小儿女”恋爱中不被察觉的心底波澜，直面畸情恋爱。同时发现都市少女恋爱时的“矫情”现象：披着“恋爱自由”的外衣，施展种种手段诱惑男性但又出以单纯面目，一心只为自己骗取感情。除此，恋爱中的文化心理，也有较丰富的表现。譬如不同地域文化对恋爱选择有重要影响，当时山东的朴实逊色于江南的风雅，让一对“小儿女”品尝到“第一次的悲哀”；在男性选择上，适于都市的，灵活变通的与乡土传统的，老实本分的，给女性带来的心理冲突，也有细腻的表现。

“女性”话题上，对女性是否应服务社会这个源于“五



四”的问题，刊物编者颇为踌躇，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对女性走入社会编者不反对，但同时特别强调女性走入社会的可怕。上海的环境对职业女子而言是险象环生的，这一看法有着市民的求安务实，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但也忽略了女性的自立自强对女性成长的重要意义。《万象》强调女性的持家功能。受都市风气的濡染养成了一些骄纵的、不懂家务的女性，刊物挖掘出了这样一些典型：自私的“新女性夫人”、幼稚的“孩子气夫人”、滑稽的“科学夫人”。影星舞女，是都市时尚摩登一族，她们的生活总被人想象成多姿多彩，风光无限，尤其是在青少年人群里，但是《万象》的影星舞女叙事，是写她们风光后面的打拼、辛苦，对时尚人物投去温情的一瞥。“女性”叙述上，《万象》着力扶持的女作家群，是引人注意的。以前她们被称为“东吴女作家群”，近来的命名“小姐作家群”，似更有理论概括力。这些女作家主要有：施济美、汤雪华、杨绣珍、程育真、俞昭明、邢禾丽等，由编者陈蝶衣扶持，扬名上海文坛，之后形成一时风气，其他市民刊物竞相仿效。她们主要写自己身边的生活——读书、学习、恋爱、日常生活，在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与真挚追求中，散发着闺秀小姐的文雅娇贵气息。小姐作家的一个特例是汤雪华，她的作品，“太大胆太泼辣”，常写坎坷，甚至惨烈的贫苦生活。小姐作家群，代表着当时的文人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对女性的另外一种想象——名媛女性。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一直活跃着这样的女性，从二30年代的陆小曼，到40年代的周炼霞。她们从小打下琴棋书画的底子，又吸收着西洋文化，擅写文章，因生活在都市又有着市民的趣味甚至颓废。她们与冰心、丁玲等时代女性一起构成多流



涌动的文坛风景。小姐作家群是这一流脉于40年代的浮现。

柯灵编辑的后期《万象》，着笔于普通的人生，日常的生活，张扬现代启蒙精神，延续发展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传统，使之在前期《万象》的社会现象批评基础上，于“国民性”的烛照中更见深度。一个民族危亡之际，关于“国民性”的思考，显得尤为迫切重要。它不仅具有反抗侵略这一政治意义，还以它深厚的文化内涵指向未来。个人与国家在利益上的疏离或背叛，也就是说个人有没有民族国家意识，是《万象》反思、批判与建设的主要视野，同时《万象》张扬现代启蒙精神。芦焚是《万象》上重要的，具有支撑性的作家，他同时以另一笔名“师陀”连载剧本。身在“饿夫墓”中的芦焚，焦灼热切地进行民族命运的深刻反省。他的有名的《果园城记》系列小说，不少是发表在《万象》上的。作者落笔于普通的生活，写乡村的宗族如何牵扯拖垮一心向外的现代追求者，写民间的不为人注意的常事，不为人尊重的边缘人，表现他们生命中曾有的爱情激情怎样被世俗利益磨蚀，写他们的人生价值，比如说书人，他们对人的想象力的培育，那种宝贵的热情与智慧的奉献如何在人们的漠视中被打扫干净，消失于他们挚爱的人间。越是普通人的悲剧，越能见出沉痛的分量。在作者看来，现代启蒙精神在现实生活在广大百姓中，如同一团腾起的干燥烟雾，没有深入进去，而现实正亟需做这样的工作。

亡国奴生涯，更是“国民性”的试金石。现实中的上海，饱食终日、荒淫无耻、勾心斗角、自私刻薄等种种堕落甚嚣尘上，《万象》主要以杂文进行了批驳。除此，《万象》积极进行了国民人格的建设。1940年夏初，由美国小说



《飘》拍成的电影在上海非常流行，之后有了傅东华的译本，柯灵接编《万象》时期，自第一期至第六期连载自己在原著基础上改编的同名剧本《飘》。这个剧本作为“苦干剧团”的开锣戏于“双十节”上演。《飘》蕴涵着战争时期人们对新的国民人格的想象。改编的《飘》中减少郝思嘉性格中驾驭男性的多变心计，突出她在困境中的坚韧与强悍，并将平民郝思嘉与贵族出身的卫希礼进行对比，力图阐明：占据社会上层的贵族，虽然温雅，但身处乱世，就暴露出他们的幻想、软弱等种种不足，而平民阶层的坚韧、泼辣才是时代所需要的。芦焚《李定国及其他》，满腔热诚写明末一个“流贼”李定国的忠肝义胆，对所谓的“读书人”，所谓“正人君子”的虚伪给以痛喝。长篇小说《荒野》，也是写一个土匪的故事，土匪“顾二顺”，是个善良朴实健壮机警的人物，官方逮匪的经过，则是上演一出内部权术争斗的把戏，所谓的逮匪正义也在这把戏耍弄中消解殆尽。在沦陷的动荡、混乱时期，《万象》注意发掘那些边缘的，为人忽视的人的美感，给人带来的灵魂撞击。楼适夷的《老妇》，写一个没有名字的普通老妇，凭着对结婚仅有十三天的亡夫的信守，延续夫家一支的命脉。柯灵认为，“《老妇》写出了中国女性的悲剧——伟大的悲剧，一种令人感动的殉难精神。我们以为是值得真切体验的一篇。”王统照的长篇连载《双清》中的高大先生，于世事纷乱中清静自守，对于村里公益的事，还是义不容辞地负起责任，这种乱世中脱俗的处世态度，应该说，寄寓着作者本人在日寇统治下的处世心态。

后期《万象》在都市文学上，致力于表现“时代的阴影”，在社会矛盾的困苦中展现备受欺侮的心灵。我们从中



看到形形色色被生活压扁的灵魂，更为令人心颤的是心灵的扭曲，尤其是善良者。对此《万象》以郑定文^[4]为主要作者，进行了充分的捕捉。他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是和作者的简单经历一样，主要集中在家庭，学校，邻里。然而在这看似单纯的题材中，作者以他优秀的心理分析品质，挖掘出了深刻清新的内容来。他的小说具有心理分析特点，但不是以往新感觉派作家所写的性本能与人的理性的冲突，而是写都市穷人灵魂善恶转化，富于生活气息，颇有陀斯妥也夫斯基之风。《万象》也注意到了中产阶级的焦虑状态。这焦虑，来自商业环境对人的渗透压抑。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下，30年代的海派小说曾进入人性的层面来反映现代人的陷落。从穆时英提出人横遭现代文明“压扁”的命题之后，海派作家努力表现人的价值如何受到扭曲。他们作品中表现了人在“物化”中产生的诸多病症：疲劳症、嫌恶症、夹缝症、孤独忧郁症以至冥想症^[5]。但对这些都市人性的开掘，也“仅仅停留在对于这个大都市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场面和节奏的描述上，尚未能透过表面而深入到都市生活及人物心态的深处。”^[6]与30年代新感觉派在都市中的一片“愕然”不同，人们又经历了十多年都市化进程以后的日深月久的体验，这样《万象》都市小说中表现出来的现代向度有了更深的拓展：关注的是都市中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心态，比如事业发展、交友、婚姻等等，由此揭示都市商业土壤对他们的渗透包围以至无处躲藏，洞察了聚焦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丰富的人性内容和大众消费社会的关系，表现了对大众消费社会深刻的批判意识与人性关怀。

后期《万象》，关于城市怀旧的随笔多了起来。随笔这



一文体收中有放，风格很适合知识者的精神漫步、思想表达。从这些城市怀旧随笔的笔调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期的战争过后，知识者紧绷的内心开始了松弛，在这一松弛中思想有了积蓄和萌发，表达着深切的民族认同感。他们怅惘着城市文化中文雅风流的歌绝，感叹着古城的韵致、情感的蕴藉，心许皇城的辉煌，想念旧城的美丽。文章中，那简劲的文言，随意、平淡中的谨慎醇厚，都体现出了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承传。

从历史背景上看，1941年的12月7日，“二战”战局发生了重大转折。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这时的国民政府认为，如果下令对日宣战，中国将获得英美等国的支持。面对来之不易的局面，在危局中苦撑待变的蒋介石十分兴奋，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中国对日长达十年之久的“战而不宣”局面宣告结束。本文力图通过当时最具影力的《万象》杂志，回到现场，呈现文化现象“原生态”的复杂性。

《万象》杂志本身是一个不平凡的存在。在当时以至后来，先后经历了批评、冷落、重新审视三个阶段，其起伏历程与人们对沦陷区文学认识过程大体一致。在当时的语境中——陈蝶衣编辑的后期，《万象》曾受到新文学家视为“鸳鸯蝴蝶派”的批评。1942年11月第2年第5期《编辑室》中有这样一段话：“最近接连看到了几篇批评文字，一篇发表于华文《每日新闻》，一篇发表于《中国青年》，此外则是发现于几种报纸的副刊上；他们同样以‘一概抹杀’的态度，将‘鸳鸯蝴蝶派’刊物的头衔，重重地压在我们《万象》的头上。”从编者的陈述来看，当时的批评攻势不小，



在一个时间段里，有几家报纸还有杂志，攻其为“鸳鸯蝴蝶派”。从编者后来称此为“正统派”与“鸳蝴派”的论争，可以确认这是由上海的新文学界发出的。自“中国现代文学史”确立以来至70年代末，因为40年代的“沦陷区文学”一律以“汉奸文学”打入另册，成为文学史的空白，《万象》也长期无人关注。

到了80年代，研究者开始注意尘封已久的《万象》。应国靖的《污泥之中的洁莲》^[7]，从抗日爱国角度肯定《万象》价值，指出前期“与敌伪不沾边”，后期是在“‘全副武装日本占领军鼻子底下’展开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虽然潜在的新旧对立视野，使他更多地论述《万象》后期的政治价值，对于前期笼统地称以“鸳蝴刊物”，但从抗日这一政治立场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进入90年代，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更新，由《万象》入手考察海派文化生产特点、40年代新旧文学融合形态等，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吴福辉先生的论文《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8]从期刊编辑类型上指出《万象》代表了海派刊物由新潮型向综合文化型的转变。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一文学史教材中着眼新旧文学转化，通过期刊版面上的作家情况指出：此类通俗文学刊物在与旧的传统不截然断绝的情况下，调和新旧关系，同时努力追求自身的现代化、新文学化。杨义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图志》^[9]一书中以《新旧文学鸿沟在〈万象〉的填补》为题，从新旧作家阵容合流、通俗作家小说已接受新文学的观念和手法等方面说明前期《万象》显示了“新旧文学壁垒一些松

